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格局

探讨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必须注意到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影响国际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对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由苏东局势剧变导致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关系走向对话、缓和，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冷战体制的结束；二是大国间的竞争正由以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为主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而使相互间的合作、摩擦、角逐、调整在国际关系中，愈来愈占有重要的地位。进入 90 年代中期，国际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大国关系仍保持“一超多强”的局面，新旧世界格局转换过渡性阶段的大国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竞争与协调、制约与合作。走向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格局也蕴育着许多机遇和挑战。

第一节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政治形势趋于缓和和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的情况下，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强。1992 年 1 月 1 日，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开始运作。1993 年 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月 1 日生效的（欧洲联盟条约》，提出了实现欧洲政治联盟的目标。1994 年 1 月 1 日起，由美、加、墨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开始运行。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了较快发展。 1996 年 11 月 25 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菲律宾召开了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通过了《苏比克领导人宣言：从展望到行动》、《马尼拉行动计划）以及《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这几份纲领性文件的发表，标志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已开始从展望走向行动。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迅速发展，是有其历史、现实的背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之一，不仅制造了东西方冷战体制，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把持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的领导权，通过实施单一的自由贸易货币体制，以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 70 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绝对经济优势的衰落，其迅速转向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美元本位制、固定汇率制的崩溃，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进入 80 年代后期，美国进一步衰落成为债务大国，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由此加剧了国际货币、汇率体制的混乱。美国为了扼制其经济实力的衰弱，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把加拿大、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控制在自己手中，倡导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在欧洲，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六国

于 1957 年 3 月缔结了（罗马条约》，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不久，英国、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等另外七个西欧国家（后来冰岛正式加入，芬兰成为联系成员国），于 1960 年 1 月缔结了斯德哥尔摩公约，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以欧共体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欧共体成员国已达 12 个。在欧共体内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政治联盟和欧洲经济区的计划，于 1993 年 1 月 1 日与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计划同时实现。

经济区域集团化在西欧得以较快发展，主要是由于这一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狭小的国家市场之间的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以及战后西欧地区特殊的内外经济和政治条件。

西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较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按发展水平均居前列。但西欧地区疆域不大，国家林立，同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比，西欧国家的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上对外依存性较强。因此，打破国家壁垒，进一步扩大市场，加强经济联合，就成为西欧国家的共同要求。

战后西欧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也是推动西欧经济区域集团化较快发展的因素之一。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已非昔日，在经济上面对美国垄断资本扩张显得势单力薄，难以竞争；在政治和军事上同前苏联相比也感到相形见绌，难以匹敌。为了增强经济竞争能力和政治上的抗衡力量，捍卫独立主权，维护自身利益，西欧国家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组成经济集团，加强相互间合作，才有可能有效地

抗衡前苏联的压力，争得同美国平等的伙伴地位。

此外，西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近，历史和文化渊源相似，地理上紧密相联，都有利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和发展。

亚太地区国家对组织、发展区域经济集团十分热心。早在1965年，日本学者小岛清就提出了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五个太平洋沿岸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建立一个“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该构想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重视、支持。在日本政府支持、倡导下，1968年1月，召开了有上述五国学者参加的国际经济会议——“第一届贸易开发会议（PAFTAD)”，提出了成立“太平洋贸易援助开发机构”的设想。与此同时，1967年由日本财界人士出面，联合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的财界人士，组织了“太平洋经济委员会（PBEC)”，研究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问题。在此前后，1967年8月，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曼谷签署《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宣告成立。

70年代中期以后，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又有了新的进展。1978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已故）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作为竞选政治纲领，提出了“环太平洋联合设想”。他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后，又将其提到国策和外交基本方针的高度，并设立了以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为组长的“日本政策研究会环太平洋联合研究组”，作为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该研究组，在1979年和1980年

先后发表了《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作为日本官方的方案公诸于世。该方案的中心思想是：在太平洋地区逐步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以日美合作为基础、以日美加澳新为主体的“新区域社会”，以加强这一地区国家的联合与合作。日本已故前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得到了美澳等国的认同。在此基础上，1980 年成立了由政府官员、学术界专家学者和工商企业界三方人士组成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其宗旨是：在自由和开放经济交流的基础上，本着伙伴关系，公平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加强经济合作，以充分发挥亚太地区的经济潜力。截至 1991 年 5 月，先后有中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日本、泰国、文莱、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台北、南太平洋岛国（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智利、墨西哥、秘鲁、香港 19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但由于它只是一个松散的、半官方的协商性的论坛机构，在交流看法、形成合作构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决定对有关国家并无约束力，推进实质性合作的能力有限，因此进展缓慢。

进入 8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经济出现了迅速增长，但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国际形势的缓和，地区关系的和解，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为了维持这种合作关系，需要建立更高层次、更具权威性和开放性的地区合作组织。1989 年，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倡导下，成立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于 1989年 11月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堪培拉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经贸部长会议。出席第一次会议的 12 个国家都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均为“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的成员（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东盟六国）。 1991 年在汉城举行了第三次部长会议，包括 15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及台湾、香港加入该组织）。会议决定了亚太经合组织的目的： (1) 促进地区发展；(2) 推进和加强已经开放的多边贸易。 1993 年 11 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建议下， APEC 在西雅图召开了 17 个成员国（墨西哥、巴布新几内亚加入）的第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确定了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认为开放式的多边贸易体系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1994 年 11 月，APEC 在茂物召开了包括 18 个成员国（智利加入）的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了（茂物宣言》，确立了 APEC 的两大任务：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及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即发达成员不晚于 2010 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 2020 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1995 年 11 月，在大阪召开了 APEC 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大阪会议），大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茂物宣言》以及两个时间表的精神制定行动议程。经过反复协商与协调，最终达成一致。大阪行动议程在强调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全面性”的同时，肯定了由于发展水平不同而应有一定的“灵活性”；各成员国都将“实施或努力实施非歧视原则”。大阪宣言明确宣布，领导人已共同选择了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调的自由化的“独特方式”，而且指出了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互助，建设性

的和真诚的伙伴关系，协商一致等。

1996 年 11 月 2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菲律宾召开了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自西雅图、茂物、大阪之后，苏比克会议已是 APEC18 个成员国领导人的第四次聚首。会议通过了《苏比克领导人宣言：从展望到行动》、《马尼拉行动计划）及《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框架宣言》明确指出：APEC 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是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保持亚太地区的持续增长与均衡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将遵循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互助、建设性的与真诚的伙伴关系以及协商一致等原则。《框架宣言》将人力资源开发，稳定、安全、高效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及中小企业确定为经济技术合作的六大优先领域，同时鼓励各成员在自愿基础上为经济技术合作做出贡献。

这份文件是自 APEC 成立以来首次通过的有关经济技术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它有助于 APEC 均衡、健康地向前发展，是 APEC 发展中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建立及其迄今取得的成果，是亚太国家多年来不断探索中寻找到的一种符合本地区实际，不同于现有世界其他经济区域组织合作形式的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创出的标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APEC倡导和遵守“开放的地区主义”。目前，世界上现有的比较大的经济区域合作组织或集团，都是以其他集团作为竞争对手，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区域经济集团的保护

主义抬头，导致集团间摩擦加剧的事例屡屡发生。而 APEC 倡导和遵守“开放的地区主义”，正如（大阪宣言）中强调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建立背离自由贸易的内向性集团，决心以鼓励和加强全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式，促进亚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核心，就是适用于 APEC 成员及非成员的非歧视性。只有摒弃以往国际经贸关系中歧视性做法，坚持非歧视原则，才能确保各成员国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公平受益， APEC 的健康发展，不断壮大。

2. APEC 以亚太地区存在巨大多样性为合作基础。亚太地区是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明显多样性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占 60% 以上，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而有的刚刚进入工业化。亚太地区人口 21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40% 。其中年收入 2 万美元的超过 18% ，但贫富差距太大，文化各异，社会经济体制也不同。“APEC 方式”正是以本地区多样性为基础，兼容、照顾和代表了发展中成员国和发达成员国的不同利益，反映了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要求。它体现了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

中国对 APEC 成员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 74% （1994 年），中国引进外资的 80% 以上来自 APEC 地区，因此 APEC 将为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

除 APEC 外，我国没有参加其他区域性或次区域性合作组织。积极参与、支持和推动 APEC 会极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开放与发展，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

1991年中国加入 APEC 以来，为维护发展成员国的利益，推动 APEC 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在 1994 年茂物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亚太经济合作的五项原则建议，即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定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在 1995 年大阪会议上，江泽民主席针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现实情况，又提出了为使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顺利进行，应妥善处理的五个问题：（1）要把世界和亚太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开展合作的根本目标；（2）要为发展中成员国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3）要坚持自主自愿原则；（4）要尊重差别，恰当把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合理速度；（5）要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并重的方针。在 1996 年的苏比克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就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原则、做法及优先领域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特别指出，APEC 开展的经济技术合作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双向合作。这种合作既提倡富帮穷，又要求各成员国根据自身的能力做出不同的贡献；既强调政府部门的作用，又鼓励工商企业的参与；既有适当的政策引导，又运用市场机制；既在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又鼓励非成员国参加。这样一种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参加者的能力。

为推动大阪会议通过的《行动议程》，中国政府决定从 1996 年起采取以下五项具体行动：（1）将对 4，000 多个税目的进口商品降低进口关税税率，降幅不低于 30％；（2）将再次取消进口商品 170 余项的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

施，占现行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30% 以上；（3）将在上海等地进行中外合资经营外贸企业试点；（4）继续扩大试办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5）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统一纳入银行结售。

目前，APEC 已从展望走向行动，但不容否认，APEC 成员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大阪会议通过的《行动议程》中，最大的争论焦点问题是农业领域的自由化问题。日本提出，“各国和各地区将可以灵活地开展自由化活动”，以十分宽松的方式提出了“综合性”原则。各国部长对此均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但韩国等依然坚决地反对农业自由化。在“非歧视性原则”问题上，美国不同意把它应用于中国，而中国却要求全面运用此原则。美国提出中国应被视为“发达国家”，从而拒绝给予中国关贸总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的优惠，这种做法破坏了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是中国决不能接受的。关于“政治安全”问题，日美提出，今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议题不应只是经济问题，应扩大到政治和安全保障问题。对此，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表明了反对态度，中国和韩国也持慎重态度。

在1996 年的苏比克会议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要求APEC 支持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谈判一项信息技术协定，到2000 年将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降为零，从而增加它们在世贸组织内与欧盟进行谈判的砝码，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成员国同意，在世贸组织内讨论这一问题，但要求在时间和产品范围上要有灵活性。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由于

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个领域的自由化，很难按照一个时间表来推动。在产品范围上也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也多次表示，促进信息技术的流动，不仅仅是个降低关税的问题，还要采取切实措施，消除阻碍技术转让的种种限制性措施。他强调指出，就世界贸易而言，有许多领域需要降低关税。除信息技术外，发展中国家成员普遍关心的纺织品等贸易问题，也应提上议程。马来西亚和智利都对美国提出的方案表示保留。

各成员国在信息技术问题上的争论表明，一些成员国企图淡化茂物会议确立的两个不同的时间表，市场开放程度高的成员国总是千方百计打开其他成员国的市场。这种打开市场与适度保护自身市场之间的矛盾，将贯穿 APEC 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始终。但无论怎样，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已开始转入实施，成员国将就行动计划进行更多的比较与磋商，尽管由于利益不同，各方分歧也将有所增加，但 APEC 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将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只要我们本着符合亚太地区实际情况的“ APEC方式 ”，真诚合作，共同努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第二节　　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

在世界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东亚各国，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对世界文明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进步、发展曾做出过贡献。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绝大部分国家深受蹂躏和践踏，致使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亚太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被世界各国所注目。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代产业技术文明的中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人们惊呼， 21 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富生机、最有活力的地区。经济力量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以较高速度持续发展，好戏连台，高潮迭起。 60 年代，日本首先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紧随其后，持续 30 年保持着世界最高经济增长率；在石油危机阴影笼罩下的 70 年代，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愈来愈快； 70 年代后期，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迅猛向前； 80 年代，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迅速崛起。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充满活力。

亚太地区充满活力，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高速持续增长。 50 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9.1%， 60 年代为 11.3%， 60 年代最后三年为 13%，相当于英国的三到四倍，为意大利、法国、西德的两倍多。像日本这样的高速发展，前后二十多年，而且 60 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还高于 50 年代，这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高速、持续发展的结果，使日本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 1950 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英国的 39％，法国的 38％，还不到美国的 4％。从 1955 年起日本经济开始“起飞”，10 年后，1966 年超过英国，1967 年超过法国和西德。到 1970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已与美国不相上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 80 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下降，但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1988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 28，589 亿美元，几乎等于西欧三大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之和（29，663 亿美元）。1988 年，在世界 25 家最大商业银行中，日本竟占了 16 家，它们合计的资产额达 38，719 亿美元，约占这 25 家银行资产总额 54，840 亿美元的 71％。

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从 60 年代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积极扩大出口，经济增长较快，经济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 10％左右。从 70 年代起，它们又开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石油化学工业和其他重化工业，继续扩大出口，由于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在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8～10％，人均产值年平均增长 7％左右，国民收入不到 10 年翻一番，从 1960 年至 1980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生产部分，韩国从 17％增加到 29％，台湾从 10％增加到 30％，香港从 15％增加到 27％，新加坡从 13％增加到 24％，它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入 80 年代后，由于受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速度一度放慢。 80 年代后期以后，增长势头又开始回升。 1988 年，亚洲“四小”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9.2％，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的增长率分别为 12.1%、7.1%、8% 和 11%。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产值已近 9，000 美元，台湾已近 6，000 美元，韩国已超过 4，000 美元。到本世纪末，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台湾和韩国的人均收入也将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70 年代后，东盟五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 1970 年至 1980 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 7.4%，不仅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 3.8%，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的 5.3%。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虽然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东盟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 1976 年至 1981 年，东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7.6%；五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7.7%、7.9%、7.7%、7.6%和 6.8%.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1979 年至 1987 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0.5% 和 9.3%，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又比上年增长 11.2%，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亚太地区经济充满活力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抓住时机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提高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

80 年代，日本向亚太地区国家大量出口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80 年代中期日元升值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把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四小”和东盟，“四小”也竞相向东盟输出资本，在这一地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连锁

式私人直接投资浪潮。1985 年度日本对“四小”和东盟的投资额为 13.5 亿美元，1988 年度剧增到 52.2 亿美元，短短三年翻了两番。投资的行业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重点已转向电子、电气机械、普通机械和汽车等制造业。1982 年至 1985 年度这三个行业，在日本对亚洲制造业投资中的比重为 38.6%，而 1986 年至 1988 年度已上升到 52.1%。据日本兴业银行调查，到 1990 年这三个行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将分别达到 4%、2%和 4.9%，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日本第二大海外生产和工业制品供应基地。与日本相呼应，“四小”也通过私人直接投资，迅速将其丧失比较优势的行业转移到东盟等国。1986 年“四小”对东盟的私人直接投资仅 2.1 亿美元，1988 年猛增至 23.6 亿美元，接近美、日对东盟投资的总和（24.3 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对东盟投资额的 32%。相互投资的扩大，促进了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东南亚地区初步形成了日本生产高技术产品，“四小”生产一般技术产品和耐用消费品，东盟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亚洲“四小”和东盟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的升级，适应了美、日市场的变化，出口急剧扩大，充分发挥了出口加工基地的作用。80 年代中期，“四小”和东盟的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分别达 21%～35% 和 18%～25%，出口能力得到很大加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资的大举进入，“四小”同日本的产业内分工关系发展迅速。日本通产省对 102 种重要产品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产品几乎都不同程度地与“四小”建立了“产业内分工”关系，其中相当部

分产品由日资企业就地生产并返销日本，这就大大加快了“四小”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向更高层次转移的步伐。与此同时，东盟的贸易结构也在加速向“四小”靠拢，工业制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明显提高。1988 年（1 月至 11 月）泰国的这一比率已达 73%，印尼为 59%，马来西亚为 49%。出口能力的增强、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工业制品交易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四小”和东盟的对外贸易。1980 年至 1988 年间，“四小”的出口贸易额由 733 亿美元上升到 2，264 亿美元，增加近两倍。东盟由 479 亿美元上升到 634 亿美元，增长 34%。1980 年“四小”的出口规模仅为日本的 57%，而 1988 年则已相当其 86%。1988 年“四小”和东盟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合计达 10.8%（1980 年为 6.5%），已超过日本，仅次于西德和美国。

1979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发展取得了迅速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1979 年生产指数为 100，1990 年迅速增加到 247。特别是从 1980 年至 1989 年，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 10.7% 这一较高水平。经济增长保持较高水准的重要因素就是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 1978 年的对外贸易额仅为 206 亿美元，到 1990 年就增加了 4.6 倍，达到 1，154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从 73 亿美元增加到 620 亿美元，增加了 7.5 倍。特别是加工贸易增长迅速，已占贸易总额的 39%，达 449 亿美元；加工贸易外的出口商品额为 254 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 41%。对外贸易额占 GN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0% 增长到 1985 年 24.1%，1989 年进一步扩大到 26.3%。同期出口额占 GNP 的比重也从 5.7% 增长到 10.5%，1989 年进一步扩大到 15.8%。

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引进外资。从 1975 年至 1982 年的 7 年里，累计引进外资约 206 亿美元（签订合同额）。此后逐年增加，仅 1986 年一年引进外资就超过 100 亿美元。进入 90 年代，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从 1988 年至 1990 年的三年里，中国共引进外资 398 亿美元（签订合同额），其中直接投资 184 亿美元，占引进外资的 46%；批准外资企业 1.9 万件，超过 1978 年至 1987 年 10 年批准外资企业的总数。外资企业产品出口额也有了显著增加，1990 年达 78.1 亿美元，占当年全部出口额的 12.6%.

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过程中，沿海省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983 年以后，中国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继而又开放了沿海 14 个城市，90 年代又建立了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八个沿海省份（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仅占全国省份数的 26.7%，占全国人口的 30.2%，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8.4%，但拥有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41.6%，全国出口总额的 52.8%，从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沿海八省占了全国各省市吸引外资总额的 70% 以上。

八个沿海省份与周边发达国家、亚洲“四小”和东盟地理上接近，运距较短，双方交易成本较低；产业和技术基础较强，易于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与周边发达国家、地区，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血缘关系以及文化传统的联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